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六〇期 ——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007d)

【史海钩沉】	珍宝岛事件真相	李丹慧
【史林一叶】	北京四中在一九六六	水流云在
【往事非烟】	见证复旦园文革片断	江帆
【人物追踪】	九十岁的聂元梓在想些什么	韩三洲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史海钩沉】

珍宝岛事件真相

• 李丹慧 •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演讲稿“珍宝岛事件真相——1960年代的中苏边界关系考察”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为回顾历史，从略。〕

1965、1966年中苏两党关系、两国关系越来越恶化，到1966年1月，苏联和蒙古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互助友好条约。这样苏联就不断地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造成了我们说的百万大军压境，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我们马上就给他戴上一个“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这个时候，中苏边界冲突事件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在次数上，规模和形式上、范围上都发生了变化。次数上增多了，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一共是4160多件，比原来大约增加了一倍半。形式、规模上也有了变化，原来是口头骂、推搡、棍棒式武斗，发展到1968年、69年，苏联边防军出动坦克、装甲车驱赶上争议岛屿的边民，还轧死了中国边民，苏联的边防军向中国巡逻队巡逻的方向点射，这样严重的事件。范围都集中在黑龙江流域的吴八老岛、乌苏里江流域的七里沁岛、珍宝岛。随着中苏边界事件的不断升级、发展，可以说中国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克制和忍让的过程。1968年周恩来指示，在中苏边界斗争上是要有理、有利、有

节，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所以当时沈阳军区把十六野战军调上来，准备在绥芬河地区打击一下苏联。绥芬河是在吉林、黑龙江省交界的地方，为什么选择绥芬河，因为绥芬河是路界，苏联的炮楼、哨所比较大，打它，苏联会疼一点。但是，周恩来指示不能动火器，就是不能开枪。十六军于是成立了棒子队，准备和苏联打。

其实到这时候中苏边界的解决方案还是有三种。第一，最好的方案，双方边防军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然后通过政治手段和平谈判。第二，我们就是搞棍棒式的武斗，不要动火器。第三，就是开枪，不惜发生战争。当时中国国内强烈的反苏氛围，中国方面选择了第三种方案。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一个在珍宝岛地区的反干涉方案，计划投入三个连的兵力，部分兵力上岛潜伏。2月19日，总参批准，外交部批准，后来报毛泽东也批准。所以，在珍宝岛事件之前，中国是做好准备了。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间、地点？时间定在三月是因为四月要召开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中共都是通过代表大会公布大政方针，这也是毛泽东运用非常娴熟的政治策略，就是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枪口一致对外。这样不但可以平息国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非常混乱的局面，也可以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因为在1969年2月份，毛泽东就安排四位老帅，就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讨论国际局势问题，包括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所以就选在3月打击苏联。选择珍宝岛这个地点是因为它是位于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而且在枯水期，这个岛就和中国大陆连在一起。而且是在1964年中苏谈判时，苏联已经同意给中国了，所以在这个岛上反击苏军，苏联不至于为这个岛而拼命。还有就是1947年时，苏军就派人在岛上巡逻了，苏方也比较重视这个岛。如果在这儿打一下，既有一定的安全系数，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再有一个考虑就是为什么选择水界，因为在那儿苏军不好调动机械化部队。当时周恩来说，在西伯利亚地区，苏军就没有建立后勤补给基地，如果要打起来，苏后勤补给就无法跟上，要是选择在新疆，就很难控制冲突规模，就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战争了。所以就选在了珍宝岛。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在1969年6月，勃列日涅夫要组织世界工人党和共产党代表会议，3月末就要召开筹备会，不排除毛泽东想给他捣下乱：让你再去当什么国际共运的领袖。

3月2日，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东北还是冰天雪地，我们的士兵都披着白色斗篷，苏联巡逻队过来，看到的都是白茫茫一片，我们跳起来就用匕首刺杀他们。根据当时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回忆，第一枪也是我们先开的。通过事后苏联向东德通报情况上看，苏军死亡的士兵多是从背后近距离被刺死的。然后在3月15号，发生了规模更大的战斗，这时候苏军已经缓过神来了，把坦克、装甲车都调上来，和中国打。中国当时前线指挥部是设在虎林，前线总指挥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萧全夫。中国用炮火还击苏军，15日战斗打得很激烈。17日第三次战斗，中国的军队没有上岛，因为在15号，苏联有一辆坦克沉到了乌苏里江，苏军想把坦克给拖回去，所以17号又上岛。中国方面用猛烈的炮火把苏军给赶回去了，坦克被中国给拖回来了，就在中国的军事博物馆展出，作为新沙皇侵略中国的证据。不管怎么说，我们事先做了埋伏，开了第一枪，但这毕竟是在中国境内，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这个事件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这个事件之后，双方又进行了哪些较量呢？

当时的苏军完全就被打懵了，3月2日，苏联边防军马上向莫斯科汇报，结果最高领导人全都不在，勃列日涅夫出国，国防部长也出国了。要不然第二次战斗也不会拖延十几天以后。之后，苏联非常愤怒，先是提抗议照会，接着召开记者招待会，组织示威游行，向西方投诉，向东欧国家通报情况。向西德领导人诉说这件事情完全是中国挑起来的，苏联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华约国峰会3月底在莫斯科召开，勃列日涅夫提出是否采取集体措施制裁中国，但是没有成功，华约其他国家也存在分歧。还有就是进行核威胁。再有就是1969年6月份，世界工人党和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有69个国家参加。勃列日涅夫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一个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思路，就是要遏制中国在亚洲的扩张。

那么中国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核心的一条就是利用这个事件做文章。先是组织示威游行，在不到10天里组织了4亿多人次的示威游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目就是《打倒新沙皇》，完全就把苏联和沙皇划到了一起。再有就是中共九大召开，4月1日，林彪做政治报告，这个政治报告是经毛泽东审批的，提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口号。号召建立统一战线，反对苏联和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谈国际问题时，谈美帝国主义的篇幅很少，因为没落的帝国主义走下坡路了，而谈到苏联时长篇大论，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当时对苏联的防备态度。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说打起来还是放他进来好，让他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九大之前3月15日，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在听珍宝岛事件的汇报时，毛泽东提出，大敌当前，动员一下有利。主张让苏联打进来，占领牡丹江，国际社会就知道了。还说中国和苏联打起来，给美国人出了一个好题目，美国人可以做文章了。接着，中国方面晾着苏联。3月22日，苏联利用中苏之间还有的热线联系，给中国打电话，说苏联的总理要跟周恩来谈话。我们的接线员说，你一个修正主义分子，社会帝国主义者，有什么资格和我们周总理谈话，啪的一下，就把电话给挂了。当然这个接线员受到了周恩来的批评，但当时还是通过外交部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我们之间已经发生武装冲突，再通过电话联系已经不适合了，以后如果有什么事就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接下来3月28日，4月中旬，苏联就不断地发照会，发声明，希望赶快进行第二次边界谈判，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中国方面都不加理会。直到4月底，中国才答复，说，你着什么急啊，我们会答复你的，稍安勿躁。拖到5月24日，中国政府才发布了关于边界问题的声明，申明中国政府历来主张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端问题。后续措施又没有了。

莫斯科方面是满腹狐疑，觉得中国是不是在和西方搞政治调情？就很紧张，想，我得给你施加一点压力。一个就是核威胁，通过《真理报》、《消息报》发表文章，宣称苏联核武器如何强大，中国核武器还是处于比较低级阶段。苏联的外交官还与美国进行接触，说我们想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打击，你们是什么态度？当时美国表态不同意。苏联通过西方媒体不断发消息，传达苏联要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了的信息。第二个威胁就是采取军事手段进行报复，1969年8月13日，在中国新疆塔城裕民县铁列克提，苏军出动300多军人，在坦克、装甲车、直升机的护卫下突袭并全歼了中国的一支巡逻小分队，中国是吃了大亏了。苏联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对中国还是奏效了。

怎么奏效了，我们来看一下。中共中央当时对中苏的战争做了一个过高的估计，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命令，说边疆省份的居民都要进入战备状态，从那时起中国的战备就进入一个超常规的状态。另外还是想要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局势，9月初同意周恩来和苏联的总理柯西金进行会谈。9月初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去世举行葬礼，柯西金出席葬礼时对中方表示他希望在返回苏联过境中国时和周恩来举行会谈。9月4日，葬礼结束，柯西金返回苏联，当飞机飞至塔吉克首府杜尚别时，苏方收到越南方面转来的消息，说周恩来总理愿意和柯西金在首都机场进行会谈，说以前之所以没有同意，是因为翻译在传达信息上有误。柯西金随即就让飞机飞往伊尔库茨克，由那儿再飞北京。1997年时，我们和俄国学者有个国际学术讨论，参加的有一个库里克，当时就陪同柯西金在飞机上。柯西金一听说这个消息就很高兴，现场就准备要谈的内容。9月11日，周恩来和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举行了一次非常著名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达成双方军人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口头协议。在会谈中，周恩来说，如果你们要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话，那就是战争。可以看出，中国对苏联的核威胁还是十分忌惮的。柯西金还提出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建议，比如贸易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通讯关系，建议恢复正常发展。周恩来说我无权答复，只能回去汇报。

9月11日的机场会谈结束之后，中国方面就从这次会谈看出，苏联不想把事态扩大化，想缓和局势，所以中国方面的态度就发生了微妙变化。机场会谈应该是发布信息的，本来是“中

苏双方在友好、坦率的气氛中进行了会谈”，结果中国方面通知苏联说“友好和坦率”不能要，就说中苏两国总理进行了会谈。苏联方面很纳闷儿，当时就问外交部的乔冠华，你们是什么意思？乔冠华耸耸肩膀、指指上面，表示我也不知道，意指这是最高层的意思。苏联也通过这次会谈摸清了一个情况，就是中国对于苏联的核威胁还是很重视的。面对中国态度的反反复复，莫斯科决定再给中国方面施加点儿压力。1969年9月16号，通过一个叫维克托·路易斯的记者在伦敦的《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正在讨论要对中国罗布泊的核设施进行打击并打算在中国国内扶持反毛势力，这两个信息发出来了。而维克托原来是苏联人，实际上是有克格勃的背景，后来跑到西方，西方一直认为他发表的东西就代表苏联官方的态度。这篇文章发表后，9月18日，周恩来就给柯西金写信，信里建议说中苏双方都应该做出不使用武力、包括核武器的承诺。9月26日，柯西金给周恩来回函，说我们可以签订一个中苏互不侵犯的专项协定。这表明在中苏边界很紧张的时候，苏联明确表态说我是不会和你打的。柯西金表示，机场会谈的四点临时措施虽是口头达成的，还没有书面认定，但是我们的领导人已经指示军队从争议地区撤离，脱离接触，不会再跟中国进行边界上的武装冲突。

那么在这之后，中国方面会做哪些反应？因为苏联已经强烈怀疑中国在向西方献媚了，苏联方面就是想息事宁人。毛泽东这边又做出两种反应：一个是缓和，1969年10月1日，毛泽东接见朝鲜的人大委员长崔庸健说，中苏分裂，美国高兴，我们不愿意和苏联打仗。因为朝鲜和苏联的关系不错，就是通过崔庸健把信息传达给克里姆林宫。还有中国开始同意第二次边界谈判，其后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开始。另外一个反应是，当时毛泽东过高估计了战争形势，认为苏联方面利用谈判来释放烟雾，然后再进攻我们。所以就有了紧急疏散，包括国家领导人疏散，异己分子、牛鬼蛇神的疏散。10月17日，林彪指示：全军进入一级战备。10月18日，总参谋长黄永胜以林副主席1号命令的方式发出了指示，边界地区进入临战状态。所以可以说，1962年我们把中苏定性为敌我矛盾；1964年在国家安全防御战略中把苏联作为敌人；1969年中苏之间发动战争，毛泽东要调整对美政策了，要联美抗苏了。这是60年代中苏关系发展的第三个关键年份。在珍宝岛事件之后，69年到71年间中国就调整了对美政策。

1969年10月的第二次边界谈判也反应出一个迹象，在谈判过程中，中方的当事人有一个突出的感觉，说每次谈完之后周恩来都不关心这次谈判怎么样，而是问，你们知道美国有什么反应？再到了1973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全国大挖防空洞。

中苏同盟关系在1964年就已经破裂了，到了1969年已是名存实亡了。这就是珍宝岛事件。

（本文根据作者2010年4月10日在三味书屋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

□ 摘自三味书屋博客

~~~~~

【史林一叶】

北京四中在一九六六

• 水流云在 •

一．山雨欲来风满楼

1966年初的北京四中，貌似平静的校园里回荡着几分风雨将至的味道。

14岁的陈凯歌这样回忆当时的四中：“在四中的校园里就行走着大批这样的学子：他们大都剃着平头，腋下夹着书本，衣着非常朴素。衣服还新的时候就打了补丁，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袜子，布鞋被脚趾顶开了一个洞也不去修补。一到黄昏，校园中就布满了三三两两的人群，或者围着体育场奔跑，或者在夕阳下大声辩论，往往争到面红耳赤而各不相让。他们中间有的能整段地背诵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开口便引经据典，以利雄辩。每逢暴雨，在水天之间总会看到奔跑呼号的身影，或者在天雷震响之际悠然漫步。一日三餐，都用铝制的饭盒盛了简单的食物，边吃边谈，服饰饮食都很难看出等级的差别。”（季羡林主编《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1年）

此时，在初来乍到的陈凯歌眼中，四中有如雅典学院一般拥有着自由的氛围，理性与睿智的因子充斥着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而就在几个月之后，四中的血统之争却几乎撕裂了整个学校，“红五类”与“黑五类”的区分使一间间原本安静的教室一夜之间划出了一道道鲜明的沟壑。昨天的后进生，今天便可能变成苗正根红的革命小将，擎起革命的大旗向他们眼中的“反动分子”奋力挥舞；昨天的好孩子，今天便可能沦为地主家的狗崽子，如钟楼怪人一般四处逃避同学的唾骂与鄙视。一个叫文革的幽灵持起“出身”这把锐器，不费吹灰之力将四中切割得四分五裂、遍体鳞伤。

17岁的赵振开在高干子弟如云的四中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当时的四中有几排平房，最北边的一排是教研室用房，南边的两排是学生宿舍，是供家远的同学住校用的。这些宿舍都称作“斋”，用数字编号，平民出身的赵振开就住在六斋。他明显地感受到了1966年初的四中在平静之下的暗涛汹涌：“我在‘文化大革命’前一年考上北京四中，文革开始时我上高一。北京四中是一所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我刚进校就感到气氛不对，那是‘四清’运动不久之后，正提倡阶级路线，校内不少干部子弟便自以为高人一等。”（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三联书店 2006年）后来，赵振开当了一名建筑工，70年代末与芒克共同创办了《今天》杂志，发表大量新诗，掀起了一代人对于文革的重新思考。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笔名——“北岛”。

而20岁的马凯此时已经从四中毕业，入了党并成为了四中初中的大队辅导员。放学之后，他总是站在银杏树下为初中的同学们解答问题，成为四中的一段佳话。四中68届初中毕业生汤伯衡在四十年后满怀深情地回忆到：“下午放学时，他又在银杏树下等我。他严肃地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少先队员要做实事求是的模范。你出废品时，还不知道毛主席的那段语录，耳边又怎能响起了毛主席的教导？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目的是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如果只用毛主席语录武装自己的嘴，放弃思想改造，就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他让我把稿子重写一遍，反复强调：‘一定要实事求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大到报纸电台的‘心得体会’，小到小学生作文，几乎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遇到困难，想起了雷锋、王杰，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提高了觉悟，战胜了困难。’因为文章中有毛主席的话，哪个敢说‘不’字。快四十年了，每逢想起此事，我都不得不佩服马凯老师正直的品格和超凡的胆识。”（汤伯衡《难忘的一九七一》）或许正是凭借这种品格和胆识，马凯才在四中熬过了五年的文革岁月，最终走到今天，成为新一任的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

四中的高干子弟，当时或是各班的学生干部，或是学校里的学习尖子。对于他们来说，父辈的荣耀就像一杯葡萄美酒，在他们的心中酿出了新甜，他们更希望成为毛泽东新一代的护驾亲兵，在鲜艳的红旗上填上一抹自己的赤色，在革命的盛宴中领到一张自己的入场券。他们似乎天生就将成为革命的接班人。

## 二．红色变奏曲

“五月的一天下午，一辆供高级干部专用的‘红旗’牌轿车开到离四中不远的什刹海体育场，接走了在北京四中初中就读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之子傅洋和他同在四中上学的哥哥，随车前来的秘书说，是到机场迎接从罗马尼亚访问归来的彭真。但第二天，傅洋的哥哥就辞去了班共青团支部书记的职务。不久，彭真的名字就出现在报端的批判文章内，成为被剥夺了权利的第一批人物。”（季羨林主编《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1年）

在革命的大潮中，四中的“红色贵族”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朵异样的浪花。可恰是这朵不大起眼的浪花却在数月之后演变成了一场席卷他们父辈的风暴。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我国兴起。”从这一天开始，四中的学生正式停课，高三年级6个班团支部组成联合支部在四中全面夺权。

在一个叫“敬亭山居”的博客中，我找到了一段当年四中学生的日记：

6月3日 星期五 晴风

今天学校的形势来了个突变，从“和风细雨”变成了势如破竹的“暴风雨”。这形势的转变，就是因为大家看了《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看了北大的七同学写的大字报，识破了“不让写大字报”、“集中火力”是一个大阴谋。同学们要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今天的课都没上，同学们义愤填膺，写了很多大字报，贴满了礼堂，贴满了教师小院。我也和同学们一起写了几张。不过自己还不是非常积极的。自己还没有亲自拟搞，大部分都是签的名。大字报不仅声讨“三家村”，而且给领导我们四清的工作队、校领导、老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接触了许多令人气愤的事实。今天贴出的大字报把我们学校“万马齐喑”的气氛冲破了。毛主席说得就是好，大字报的成功就是大。一切牛鬼蛇神都会在大字报的面前发抖。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今天贴的这些大字报中，也有一些意见提得不恰当，甚至有些混淆了敌我矛盾。这些应该纠正。我们应该把它作为前车之鉴。自己看了大字报，对许多意见不清楚应该肯定还是反驳。另外自己应该如何参加，如何批判，也不十分清楚。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学习毛主席著作。这点一定要坚持下去。

6月4日 星期六 晴阴

今天形势又有新的发展。许多老师都揭发了杨滨的错误。问题越来越清楚了。杨滨的问题绝不是什么受骗的小问题，而是与反党黑帮有联系的大问题。她维护邓拓黑帮，压制同学们大张旗鼓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我们以前受了骗，真是太令人气愤了。这个“高水平”的校长要把我们往什么路上拉？！假如现在不把她以及其它一切牛鬼蛇神揪出来，我们的学校肯定会成为地地道道的三家村黑店。这真是太危险了。……

今天我们学校又有一件喜事。市委工作队派了三人的工作队到我们学校来领导这次文化大革命。同学们都欢欣鼓舞兴高采烈。大家高呼共产党万岁！……

6月15日 星期三 晴

今天上午整理材料。

下午开了斗争杨滨的大会，我们听喇叭。这个老奸巨滑的反党分子，一点儿不老实，根本不承认反党罪行。净往别处扯。根本没交代什么，还说大家提的问题不符合实际情况，真是太猖狂了。同学们气愤填膺，高呼口号。虽然今天杨滨没交代什么问题，但她的气焰被煞下不少。通过今天的斗争会可以看到今后的斗争还是会很复杂。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6月21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晚上开了斗争刘铁岭的斗争大会。开始由他作检查。开始他给自己扣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以后所说的问题基本上都是大字报上所揭出来的。同学们、老师对他的检讨非常气愤，大家打断了他的讲话，对他提出了许多质问，大会达到了高潮。最后工作队长讲了话，目标是坚决支持同学们的行动，对刘铁岭提出了最后通牒，限他一天时间老实交代，否则就按照党的政策严办他。工作队长的讲话为同学们撑了腰，大家对他的讲话表示热烈的欢迎。听说会后刘铁岭狼狈逃跑，骑上被拔了气门芯儿的自行车拼命跑，唯恐同学们追上揍他。

今天听他的检讨开始是受了骗的。首先自己对他抱有幻想，听起来就有些放松警惕。自己对主席的“敌人不打是不倒的”这个教导体会得还是很不够的。这次又给了自己一个很好的教训。通过今天的受骗也可以看到自己的阶级观点是不够鲜明的，对敌人的花招儿没有灵敏的嗅觉。……

6月30日 星期四 阴、晴

今天上午开了斗争杨滨的会，她开始做了“检讨”，但只是放了两个多小时的屁，丝毫不交待自己的问题。同学们非常愤怒，纷纷发言，揭发和驳斥了杨滨。以后杨滨就要经常在学校了，我们必须做好精神准备，与她与一切牛鬼蛇神进行坚决的斗争。

杨滨校长，一位从延安时期成长起来的党的教育家，在6月的狂潮中，被“革命牌”的笔杆勾画成了“牛鬼蛇神”。

在四中入团、入党，亲历了北平解放，在四中呆了整整17年的刘铁岭老师也被红色的扫把扫进了牛鬼蛇神集中营。

翻开这位四中学生的日记本，看到一句又一句如此革命的口号，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当时的四中确实开始陷入一种群体性的疯狂。这种疯狂无分成绩高低，无分年级大小，像一个无底洞一般吸收一切。昔日对校长尊敬有加，今日却能够在这“牛鬼蛇神”背后狠踹一脚与她斗争到底；昔日还在用理性的尺子衡量着真理的长短，今日却掏出了革命的圆规去画出阶级的半径。是什么让四中走向了这种群体性的疯狂？或许就是那种对于“革命”的无限崇拜。这一代的四中人毫无疑问都把自己的理想根植在了这种崇拜之上，当他们坚信自己是为理想而战、为革命事业而战时，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走入了一个迷局。

### 三．一场“伟大”的考试改革

四中作为北京市的顶级名校自然在革命上也有其“高人之处”。在从内部得知中央高层的意向后，四中的高干子弟完成了一项壮举——废除高考。一群高考中的佼佼者起来砸烂了他们为之寒窗苦读的高考制度，这是怎样的精神力量！

1966年6月，当时在四中高三（五）班就读的几个高干子弟从父辈那里打探来了中央有意废除高考的消息，又听说女一中（现161中学）写出了《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政治敏感使他们不甘落后。于是一篇洋洋洒洒的“革命宏文”炮制出炉，这就是《北京市第四中学全体革命师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全市师生的倡议书》。于是，男女两所高干子弟云集的中学联手将高考制度推向了终点。被公认革命形象好的四中高二学生王倩倩与另一名女一中的同学被选派来到北京电视台宣读了信与倡议书。在一个电视有如熊猫般珍贵的年代里，四中的学生想尽办法观看了这次直播，与其说去真切地感受一下高考制度废除的喜悦，倒不如说是去享受那“革命成功”的精神快感。

“就在这个月的一天，北京四中初二学生刘源（刘源当时名字是刘源源——编注），把一封轻飘飘的信件，悄悄搁在了时任国家主席的父亲刘少奇的案头。把信交给刘源的时候，高三（五）班的两位同学很郑重地告诉刘源，说是要造反，要造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反，说当时的教育考试制度让白专的留下来了，把闹革命的、工农兵都挡在学校外面了。刘家有规矩，不允许捎信。刘源不敢把信直接交给父亲，只搁在桌上。而这封信就刊载在1966年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刘源：《邓小平批准我参加高考》）

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发出，新中国在1952年建立起来的统一高考制度就此而废。

而11年后，同样还是刘源，写信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要求恢复高考。历史像是跟刘源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让他用两封信两次影响了中国的考试史。

#### 四．东风肆虐

文革初起之时，四中的老红卫兵们以为，文革无非是再一次革牛鬼蛇神的命，跟“三反五反”和“反右”一样。而他们则是天然的革命力量。

然而，他们渐渐发现自己父辈的名字在报纸上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渐渐发现叔叔们的脸色开始变得异常。他们发现，在这场革命中，今天还在台下向反革命、黑帮分子们猛烈开火，明天就很可能变成走资派和叛徒的孝子贤孙。这场由他们自己点起的革命之火正在向他们父母乃至他们自己身上蔓延。

如果说6月初，他们还只是为了革命而革命，那么现在他们为了保护自己不得不为这场革命找到一个合适的目标，为自己捏造一个“替身”，而“黑五类”与“四旧”便不幸成为了他们中意的对象。而此刻的中央文革也不急于露出他们的真实意图，颇为乐呵地看着老红卫兵们搅得整个北京天摇地动，因为乱局恰恰正是他们孵化党内风暴最好的温室。

1966年8月到9月，北京——这座千年古都里所发生的一切，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震惊。

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红卫兵掀起一阵红色风暴。

在这种血色弥漫的环境中，四中无法出淤泥而不染。

8月4日，四中爆发了文革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流血事件。四中的校领导与教师们被勒令排成一队，有的带着高帽、有的挂着罪状、有的剃成阴阳头、有的被捆着双手，围绕着操场像游行示众一般走了一圈又一圈，接受着小将们的怒斥甚至拳打脚踢。

与此同时，一场“保卫首都”的驱逐行动，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约十万北京无辜居民，被遣送、押解、流放到农村受难。当时所有的报刊对这一有组织、大规模的违宪迫害行动，没有作任何报道。在中央文革、“首都工作组”的指使纵容下，水利电力部北京勘测设计院东方红战斗组于1966年8月23日率先发出了《最后通牒——家属中的四类分子立即滚蛋》的通令。

8月24日，四中文革会立即做出呼应，以“北京四中革命师生”名义发出《通令——关于驱逐四类分子的五项命令》。命令“一切钻进北京的地、富、反、坏分子必须滚出北京。滚回老家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如不老实，立即镇压。”



不知这张传单是否也该收入四中百年纪念文集？

## 五．怪胎“西纠”

8月25日，北京市四中、八中、六中等31所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在北师大附中集合，发起并成立了以贵族红卫兵为骨干的第一个跨校联合组织——“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而西城区纠察队的领袖，正是四中高三（五）班团支部书记孔丹。

至今为止，对于“西纠”的争论仍未停止。有观点认为“西纠”在文革之中通过著名的“西纠1—10号通令”起到了规范红卫兵行动、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这里我有必要对于“西纠1—10号通令”的内容进行一些摘录：

第二号通令——一切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拦截首长汽车，不得搜查首长宿舍。违者，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立即扣押！明知故犯者，严加处分！切切此布。

第三号通令——查抄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家，一定要通过本单位的红卫兵总部，一定要与当地派出所和各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联系，所缴获的一切财物都要归公！在查抄时，要提高警惕；要以文斗为主，后发制人，要严防坏人捣乱，钻空子。

第五号通令——在今后的文化革命运动中，严禁打人，严禁体罚和变相体罚。严禁侮辱人，严禁逼供信。

### 第六号通令——

#### 一、关于文斗

我们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打人、体罚及变相体罚、侮辱人、逼供信、等等，都不是文斗，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 二、关于体罚及变相体罚

跪、趴、弯腰、负重、游街、长时间站立、长时间举手、长时间低头、长时间做重活，等等，都属于体罚及变相体罚，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 三、关于侮辱人

“挂黑牌”，“戴高帽”，“唱嚎歌”，“剃光头”等等，都属于侮辱人，都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 四、关于逼供信

不注重调查研究，不注重事实证据，反而片面轻信口供，迷信口供，并用武斗或威胁的方法逼人口供，逼出来了就信，这就叫逼供信。这种做法是盲目的，极易被坏人利用，这不是我们所应采取的斗争方法。

#### 五、关于劳动

应该组织参加劳动，这样便于对那些人进行改造，但一定要区别对待，一定要适量，老弱病残劳动的时间不宜过长……

通过上述的这些通令，我们可以比较客观地说，在那个已经“砸烂公检法”的社会环境下，“西纠”的一系列行动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他们阻止红卫兵对于老干部的冲击，规范批斗会的规格与纪律，保护外宾的安全以留下中国在外交场合的最后一分颜面，也因此有四中的校友曾戏称孔丹为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以至于“西纠”的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甚至得到了国务院的直接支持，周恩来就曾指示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为“西纠”安排住房、交通、印刷等各种活动的便利条件。

与此同时，又有一些人将“西纠”视为血统论的忠实拥护者、一群疯狂的红色贵族，认为他们保护老干部的行为完全是为了保护其个人的阶级特权，平民出身的红卫兵们更是对“西纠”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仇恨感。

事实上，“西纠”本身也是一个失控的组织，“西纠”的上层机构对于下层的组织很难加以控制，“西纠”上层的命令也根本无法得到彻底的贯彻，所以我们无法把“西纠”的过错仅仅归咎为其领导的责任，也无法仅通过其部分组织的行为来定义“西纠”的性质。当时，有的组织打着“西纠”的旗号为所欲为，采取的行动甚至比红卫兵刚刚兴起的那段时期有过之而不及，而正是这些可能并非“西纠”直接授意的行为激起了对于“西纠”的全民性愤怒，为“西纠”的覆灭埋下了伏笔，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六中的地下监狱。可以说，“西纠”是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一个理性与疯狂所共同孵育的产儿。

四中不仅是红色贵族的集中地，四中同样有着数量不少的平民子弟，他们也不甘心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一言不发，于是他们站出来成立了“新四中公社”，与“联动”公然叫板，他们在大字报上写下了“联动”的条条罪状：

某高干子弟曾经这样露骨地质问领导：“你为什么不保送我去军工？你不信任我？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于是这位显贵人物被送进了军工。这正勾画出了联动分子宣称的阶级路线的内容，就是唯高干出身，他们借此不费吹灰之力地入党入团，执掌一切大权，使这些利欲熏心的人物，可以扶摇直上了。他们所谓的阶级路线，只不过是这个集团利益而服务的特权罢了！

.....

××说过一句话，“我们的孩子就是龙子龙孙！”然而一小撮联动分子，偏要把这样的家庭影响美化成“革命前辈”的关怀。他们根本不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把父母的话奉若神明，长期以来处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包围之中，没有丝毫抵抗。最后成了刘邓路线顽固的执行人，可悲的牺牲品。事实胜于雄辩，撰写天方夜谈的“解放全人类”的编辑老爷们，让你们的“西纠”，“联动”小将抱着自己的“特权”见鬼去吧！

不论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是否真实，从其中折射出的仇视之情就已经令人畏惧。昔日的同学此时已势同冰火。

## 六．因为我坚信……

1966年，四中经历了它百年沧桑中最跌宕的一段岁月，这一年也绝不仅仅是校史中“文革爆发”四个字所能一笔带过的。

这是一段难以回首的岁月，这又是一段必须回首的历史。

每每读到这段历史，我都暗暗心痛，我不相信那些如此荒谬的故事就曾发生在我脚下的这片校园。毫无疑问，少有四中人是心怀邪念地参与这场革命的，但是在社会强大的磁场里，没有哪颗磁针可以自己转动，于是他们便集体迷失了方向。但每每读到这段历史，我又暗暗庆幸，庆幸四中人即使在那个群体性疯狂的时代里，在那个热血冲破理性的时代里，也还或多或少地保留了那么一份四中人特有的精神。

从文革一开始就变成了“牛鬼蛇神”的杨滨校长，曾多次回忆起她被押去中山公园参加对北京市“黑帮分子”的批斗大会的情形。各校愤怒的学生们提着腰带、木棍围上来，是四中的孔丹、秦晓、张小彤等学生党员和骨干围成一圈把她保护在中间，一边高呼口号，一边大声喊：

“不要打人！”冲过人群把她带进会场，散会后又护送她回校。她腿疼，走不动，是赵胜利把她背着送回“牛棚”的宿舍。那天有好几个老干部被打伤了，可她记得只是头上挨了一皮带，而四中的同学却为她挡了多少棍棒，挨了多少打。

孔丹曾在四中的“八四武斗”中走上讲台，首先领大家学习“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毛主席语录》，然后明确指出，批斗学生不是运动的大方向，不同意开这样的批斗会。

而孔丹、秦晓恰恰正是文革中鼎鼎大名的“西纠”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是“红色贵族”，他们是“革命领袖”。红卫兵的负责人却站出来保护所谓的“牛鬼蛇神”，声称批斗学生不是运动的大方向，这或许就是文革之中久违的良知。

同样还是在四中，这个血统论的捍卫军——“西纠”的大本营。1966年底，深深赞同《出身论》观点的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系地址，找到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商议办起一份《中学文革报》，全文刊载《出身论》。是因为他们的帮助，遇罗克的《出身论》才得以在年轻人当中广为流传，成为中国思想解放潮流的第一股浪花。

北京四中学生赵京兴，公开质疑当时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是披着马列外衣的独裁政策。他因《中学文革报》和“出身论”的牵连被作为重刑犯关押。据说当时并没有拘捕他的女友陶洛诵，而她自称为七十年代的燕妮并屡次到公安局抗议对赵京兴的刑事处罚，后来甘愿和赵关在一个地方，以表示对正义和爱情的坚定与追求，这岂不有些十二月党人的壮烈与悲情？

闪耀在混沌之中的理性与挺立在风雨之中的真情，使得四中即使在文革之中也有了几分卓尔不群的气质。

四中的1966年是一个迷惘的年份。满怀激情的四中人们被“为革命建功立业”的诱饵引进了文革的迷宫。于是，他们怀着梦想打倒梦想；他们怀着理性打倒理性；他们批斗老师时慷慨激昂却又在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他们在抄砸书店时如狼似虎却又在夜深人静时掏出课本悄悄看上几眼。

在文革的烟瘴里，他们只是一群迷了路的孩子。

转眼间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年轻人如今也都已走向了人生的制高点。而无论他们今天的成就如何，1966年终将是他们记忆里一个绕不过的节点。

在历史沉重的雕像前，我所要做的便是用我的拙笔去把它描摹下来。

因为我坚信——历史不能容忍谎言；因为我坚信——历史不能容忍忘却。

□ 原载《记忆》五十二期

~~~~~

【往事非烟】

见证复旦园文革片断

• 江 帆 •

◇ 见证复旦园“斗鬼风”

回想44年前的炎热天气，1966年8月6日一早，突如其来的“斗鬼风”好像是一夜之间就席卷了复旦园。

按日期来说，它本应在我保存的文革初期一段日记（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网刊《民间历史》）的区间之内，可是，日记对自己所目睹的这么大的一桩事件却无一字记录。为什么回避记录呢？现在想来，主要是它来得太突然，整个校园恐怖一片，脑子也乱哄哄的，以致不知该如何落笔才能写清楚，才能表达我的惊悸、疑惑与反感。现在很后悔，为什么当初就不去尽力记录一二呢？但后悔也没有用，没有记录就是没有记录。

读到《陈丕显回忆录》时，特别注意此书中的有关文字：“8月5日，复旦大学校园内刮起所谓‘斗鬼风’。仅5日至7日三天，就有近50名专家与干部被戴上高帽，脸部被墨汁涂黑，遭到揪斗。之后，‘斗鬼风’迅速蔓延到各高校，一批领导干部和教授被作为‘牛鬼蛇神’、走资派揪斗。批斗过程中频频发生打人、罚跪等无视人格尊严、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诸如此类的造反闹剧越演越烈。”

这场“斗鬼风”从何而来？谁是揪斗的对象，谁又是揪斗的主体？它是“造反闹剧”，还是“保皇丑剧”？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丕显这段回忆文字给出的答案，显然是模糊的，混淆的，语焉不详。

据本人回忆，当时现场外围亲眼所见，被粗暴揪斗的尽是一些专家、教授、学术权威。揪斗得最厉害的、名气最大的有数学系的苏步青、生物系的谈家桢等；中文系的朱东润以“反革命傲骨”著称，硬是不肯低头下跪；还有一个是有名的“大叛徒”，外文系教过我们俄语的黄有恒，就是《王若飞在狱中》书中写到的那个黄平。揪斗黄有恒的场面声势浩大，他每交待一件罪行，就遭到一顿拳打脚踢。本人所在的新闻系，没有重量级的人物，就拉出来一个写杂文的“反动杂家”林帆，戴着高帽子押着游街，他当时不过是个讲师。杂文杂家必是“反动”的，报上大张旗鼓批判的邓拓及“三家村”是写杂文的杂家；中文系学生批斗的徐震也是写杂文的杂家。徐震这时已成“死老虎”，墙倒众人推，他的笔名“公今度”也被附会为“攻击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斗得浑身上下是墨汁，一塌糊涂，真像个“鬼”似的。细数复旦园被揪斗的“牛鬼”，除了这个原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现任校党委宣传部长的徐震可称做领导干部外，不见当时还有其他什么领导干部、当权派被揪斗。按《陈丕显回忆录》的说法，一批领导干部和教授一起被作为“牛鬼蛇神”、走资派揪斗，这起码与复旦园里的事实不符。

事实的真相无须辩驳。

“8·18”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前，复旦园中，“造反有理”的号召还没有响起，造反派还没有公开亮出旗帜并串联，红卫兵组织还没有筹建，怀疑校党委的“战斗队”还是各自为战，不可能一夜之间形成如此步调一致的“造反”行动。

我当时是新闻系一年级造反派“十二人战斗小组”的成员之一，我可以拿人格担保，在“斗鬼风”中，我们小组决没有任何一个造反派同学上前去揪斗、打人（在整个文革过程中都没有！），也没有看见一个熟悉的其他造反派同学参与揪斗、打人。什么叫“造反”？那是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反派学生当时的矛头所向，是校党委及其代理党委书记王零（还有上面的杨西光），对“斗鬼”非但不感兴趣，而且大多是反感的、抵触的，有的造反派学生甚至公开出面反对和制止。“诸如此类的造反闹剧越演越烈。”决非造反派所为，压根儿就戴不上“造反”的帽子。

“斗鬼风”分明是一场“保皇丑剧”。8月11日，谭启泰、欧阳靖两同学贴出万言大字报：《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王零精心培养的这两个笔杆子反戈一击，震动了复旦园。这张大字报不啻是一颗重磅炸弹，把许多内部材料抖落了出来，揭露复旦党委“用‘斗牛鬼蛇神’的借口来压制群众揭露未揭露的牛鬼蛇神”，刮起一股“有统一组织，有统一领导”的“斗鬼风”。事实表明，“斗鬼风”是有预谋、有部署的统一行动，是由复旦校党委为转移斗争大方向，压制群众造他们的反，一手导演的，从而“越演越烈”的闹剧、惨剧。好在现在还能看到复旦师生中一些当年亲历者、目击者的回忆，就我所看到的文字，有三个人回忆录是同我记忆中的印记相互重叠、相互印证的。

这是有力的历史见证。

最早的有关回忆见于安文江的《我不忏悔》（原文参见1989.5《东方记事》）。安文江当时是复旦中文系四年级（62级）学生，复旦三大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之一“红三司”勤务组负责人，人称“安司令”。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回忆与反思，真可谓震聋发聩的一声呐喊。他对复旦园里的“斗鬼风”是这样描述的：

上海市委为控制形势，率先在人民广场支持成立上海红卫兵。复旦党委闻风而动筹建红卫兵大队部，以持保守态度的党团员为主干，当然排除了已在串联亮相的造反派。我们则针锋相对筹建造反派红卫兵，后因观点不同，分成“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公社”三伙。

保守派红卫兵比我们更迷茫、更痛苦。他们敏感到毛泽东、中央文革以越来越鲜明的态度冷落他们而支持造反派。像最孝顺的儿女得不到母亲的理解，他们产生了凄绝情绪。为了表白他们的忠心，一反温良的常态而渲泄积聚的忿懑与绝望。于是，复旦的保守派在炎热的8月发起了癫狂的“打鬼运动”，粗暴地揪斗了一大批“牛鬼蛇神”。

在球场的乒乓球桌上，苏步青教授被保守派押上台，主持大会的是我们年级的团支书，一位质朴善良的女同学。她声嘶力竭地声讨、斥问。突然把一瓶红墨水喷洒在苏教授谢顶的头上，随即推到台下，责令他在晒得冒泡的柏油路上做狗爬……我被她的突变震愣了。

记述得最为详尽、细致、真切的，是曹为平的专题网文《复旦大学八·六斗鬼风》。曹为平当时是物理二系64级的造反派学生。他说到的“斗鬼”情形，正是当时我在操场外围所看到的场景：

第二天一早，我才起来就听到复旦大学横贯东西的主要大道，我们称之为“南京路”，其北面的操场上十分热闹，该操场的东面是学生宿舍八号楼。我急忙赶到那儿，那儿已经到处是人，斗鬼风已经开始了。所有的乒乓桌现在都改成了斗鬼台，桌上站着好多个后来被我们称之为保守派的人，还有一两个牛鬼在那儿跪着，多的跪着三、四个。正是盛夏，不少都是汗流满面的，手里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某某分子某某某。乒乓桌周围围满着人，我来得晚只有站在外面。那些牛鬼被反架着手，在他们背后的保守派则正在对他们拳打脚踢，有的还用手揪着头发。

曹为平还说到一张《斗鬼风从何而来？》的大字报，这也勾起了我的回忆：

这斗鬼进行了一个上午，我的注意力完全被转移了。到了下午大家就要回家，似乎经过一个星期天，昨天传达的中央精神就要冷场了。可是实际情况没有按照复旦党委的如意算盘转。当我离开斗鬼场准备去吃午饭时，看到在“南京路”上有人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斗鬼风从何而来？》文章不长却尖锐地指出，为什么早不斗晚不斗，昨天才传达了中央精神就出现了斗鬼风，指出这场斗鬼风完全是预谋的，目的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把大家的注意力从中央精神移开。看了这张大字报我豁然开朗，立即觉得自己是上当了，被转移了注意力，而且马上想到下午大家要走，这不是要使中央的精神冷场吗？许多人纷纷起来对这次斗鬼风进行了质疑，保守派们

就说我们反对斗牛鬼蛇神，包庇牛鬼蛇神，是反对文化革命，专门反党。

最为清醒的回忆、深刻的思考，从历史的高度看问题，我认为要数被誉为“最有风云气著述”的吴中杰的《复旦往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作者吴中杰是复旦中文系毕业的留校教师，复旦风云的过来人。他在写作此书时，借用了当年复旦大学文化革命《大事记》和《大字报选》这两本难得的原始资料。吴先生的记述不妨在此多摘录一些：

“斗鬼风”是从8月5日傍晚批斗经济系老教授萧纯锦开始的。接着，在8月6日、7日两天之内，接连批斗了30多名被抛出来的“牛鬼蛇神”，红色恐怖席卷整个校园。

这个行动显然是有计划、有准备的。事先，在生物楼与学生宿舍之间的体育场上搭起高高的批斗台，然后各系拉出本系的“牛鬼”上台批斗。

中文系的批斗对象是朱东润和徐震。

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主持批斗徐震、用红黑墨水浇得他满身满脸的，竟是徐震当年做中文系总支书记时一手培养的班干部，现在她们却对过去的顶头上司下此辣手。倒是揭徐震小组的同学，明确提出反对这种做法，这个小组中有一位平时很腼腆的女生，这时却勇敢地跳上台去，试图制止这种野蛮行为，指责他们这样做违反政策，而且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但中文系还不算是最残酷的。数学系的苏步青在被批斗之后，还带着纸做的牛头帽子游街，当然也是满身红黑墨水；生物系在批斗谈家桢之后，用绳子捆着他在地上拖了很长的一段路，拖得死去活来；而七十多岁的化学系教授赵丹若，……斗完之后，还要游街，残酷的学生用草绳捆住他从台上直接往下拉，不幸当场就跌死了。

在“斗鬼风”的高潮中，大字报栏上还贴出一张漫画：《牛鬼蛇神群丑图》，把周予同、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等人都丑化了一通。这张漫画在当天晚上就被“孙悟空”（注：即哲学系有名的造反派学生胡守钧，后为“东方红公社”负责人）揭下，他们反对这样做。

红色恐怖虽然吊起了一些人的嗜血的胃口，但是也遭到许多学生的反对。因为这些学生认为，这股红色风暴干扰了他们揭发党委的大方向，所以断定这是党委搞的阴谋，从而提出了谴责。于是党委有人放风说：“斗鬼是群众自发的要求。”这当然无法令人信服。这样一场有组织有部署的统一行动，岂是“自发要求”所能搞得起来的？于是王零又在全校大会上提出了对牛鬼蛇神应如何斗争更为有利的问题，又被一些学生指责为推卸责任，转移目标。

吴先生接着感叹说：

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有些当年自己被打入牛棚，吃到许多苦头的人，却在各种场合慷慨发言，把这场恐怖风暴的责任，加到不该为它负责的人群身上。因为此时，原党委的领导人都已复出，重新掌权矣。这真是文人的悲哀，悲哀的文人呀！

不过，他也写到，也有能够保持清醒头脑的知识分子。

谈到历史的真实，吴中杰先生更是感慨不已：

现在看一些回顾那段时期历史状况的作品，大都是义愤填膺的文字，而且多的是脸谱化、程式化的描写，有些人物成为罪恶的符号，而另一些人物则成为正义的化身。这大概就是欧阳修所谓“人情成是而败非”的观念作怪罢。但历史并不如此单纯，实际情况远较此类描述更为错综复杂。过来人刻意跟着某种调子转，改变历史真实的叙述，是一种奴性的迎合；后来者因无知而随声附和，是一种盲目的跟从。

是的。历史并不如此单纯。历史也并不如此混沌。历史，更不会因为某些人刻意改变历史真实的叙述而改变。

◇ 见证复旦园“追穷寇”

上个世纪60年代远去了。几页泛黄的笔记，稚嫩的笔迹，却保留了我在文革初期一小段日记的原始面貌（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网刊《民间历史》）。至今，整整44年逝去了。当年我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一年级（65级）学生。这几页不起眼的日记片断让我想到一句话：再淡的墨水也胜过最强的记忆。

（1966年）7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新二的十一位留校同学贴出一张大字报：《四十个为什么》。

上午十点钟，市委政教卫生部常溪萍部长召开座谈会，我们“十二人战斗小组”有吴聚芳、甄大军、朱振良、张家厚四位同学参加。据他们传达，常部长说：“复旦党委是好的”，“如果你有材料证明王零符合牛鬼蛇神，那就可以派工作组。怀疑不能作结论”；“关于‘追穷寇’问题，就是不断革命，这个问题提得好”，“对于《红缨枪》，同学应当鼓励。追、揭、批，不要抓字眼，而要看它是歌颂二周，还是批判二周”，“究竟是不是党委领导的？不仅《红缨枪》，就是所有的大字报都是党委领导的。应当抓，应当领导，不领导是不对的。”“这个墙报主要是搞批判，这是市委的意思，是要创造重点批判的经验。复旦走得快，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红缨枪》与徐震又可以联系，又可以不联系”，“徐震有问题，《红缨枪》不一定有问题。”“假如复旦光这个东西，没有揭露其他的问题，那就坏了，实际上复旦揭露了不少党内外牛鬼蛇神。假如这个小组只搞这些东西，不参加其他同学揭露其他问题，那就有问题，这是阴谋。”又说：“运动发展过程，都是先从党外，然后到党内。”并“希望反映情况的同学自己考虑一下，不对的不要坚持，自己加以改正。”

从我的这则日记可以看得出来，常溪萍部长是尽力在为复旦党委以及《红缨枪》“批二周”的墙报打保票，并说“这是市委的意思，是要创造重点批判的经验”。

红缨枪、批二周、追穷寇，这都是复旦园文革初期频频出现的关键词。

据《红缨枪》成员之一的欧阳靖在《复旦生与死》的网文中回忆：校党委代理书记王零让“十三太保”（严格地说这个称谓是到了文革初期才叫开的，现在采用此名是为了行文的方便）办一个内部刊物，刊名也是他亲自起的，他说“我已经想好了，就叫《红缨枪》吧。”刊物的内容包括理论探讨、调研报告、时事述评等。……这刊物以油印稿的形式办了几期，文革就开始了。“红缨枪”结束了自己“内部理论交流”的使命，走到前台，试图扮演一个指导复旦文化革命、对复旦舆论举足轻重的新角色。

1966年7月3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复旦大学陶增衍、欧阳靖、谭启泰（当时均为《红缨枪》成员）的署名文章，公开批判“封建余孽”、“反共老手”周予同。这段时期，号称“复旦党委机关报”的《红缨枪》在校园主干道“南京路”集中张贴了“批二周”及十论“追穷寇”等一批墙报。复旦历史系教授周谷城、周予同合称“二周”。《红缨枪》墙报十论“追穷寇”，所谓“追穷寇”，就是批“二周”这样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对这些“穷寇”穷追猛打。

复旦园开始出现保守派与造反派两种对立观点之争：是“批二周”，还是揭党委？

徐震，成为造反派冲破复旦党委步步为营防线的一大缺口。原任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的徐震，这时任校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具体掌管《红缨枪》。6月25日，中文系四年级的安文江（后为复旦三大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之一的“红三司”勤务组负责人）等十余位同学（即后来有名的

“过河卒”小组)贴出《徐震是什么人》的大字报,接着又贴出了《二论》、《三论》。

7月6日,我们新闻系一年级十二位同学(包括本人)贴出评《红缨枪》十论“追穷寇”的长篇大字报,每一节都有个非常尖锐的小标题:“《红缨枪》握在徐震手里”、“《红缨枪》竭力回避主要矛盾”、“《红缨枪》要把我校文化革命引向邪路”、“‘揭’字当头,还是‘批’字当头?”、“《红缨枪》制造了种种清规戒律”、“《红缨枪》为谁效劳?”这张大字报有十二名同学签名,由此组成“十二人战斗小组”。以参加的人数来命名,这在复旦各系造反派众多的战斗组中,大概是独一的。

在当时,怀疑党组织就是“反党”,写大字报揭露校党委的学生背地里被称做“活跃分子”,政治上是有很大压力的。“反右派”、“秋后算账”的阴影或明或暗地笼罩着。有人放出空气,说什么1957年哪个系哪个年级有多少比例的学生被划成右派。我的日记片断中也记录了这一时期对立面散布的调子:“让他们去放吧!”但是我们“十二人战斗小组”的这些同学,一是认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定的斗争大方向,你越是压制群众、转移目标,就越是咬住不放;二是仗着家庭出身好,阶级感情深,基本上是“红五类”,总觉得没有什么辫子可抓。

当然也有很多旗帜鲜明为《红缨枪》叫好的,如电光源实验室工人专家蔡祖泉等人就写了一张大字报:《红缨枪》好得很!追穷寇好得很!这显然是要借蔡祖泉的大名来保《红缨枪》。“让他们放吧!”“工人说话了!”这都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老套路。

7月中旬,围绕《红缨枪》,新一轮辩论开始了。复旦造反派顺藤摸瓜,进一步把《红缨枪》与徐震问题联系在一起,提出“徐震问题必须挖根”,并质问:“谁为徐震保驾?”7月16日,如我的日记所记,新闻系二年级十一位同学贴出长篇大字报《四十个为什么》。这张大字报,副题为《关于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疑问》,矛头直指复旦党委,点了王零的名。这十一位同学,即有名的“杀阎王”战斗小组前身。

最有影响的大字报,是外语系三年级孙月珠等同学就本系的“阶级路线”问题贴出的《一问校党委》;孙月珠等同学还率先提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复旦党委面临直接的、尖锐的挑战。两派的大字报、大辩论针锋相对。

7月31日 星期日

外三孙月珠等同学提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党委作参谋”的口号,引起一场大争论。很多同学贴出大字报,说这个口号是“反革命的”,说他们想“夺权”,等等。隔了两三天,孙月珠她(他)们重申“一切权力必须归文化革命委员会”。

8月2日、3日的日记,记录了这场大辩论以及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陶增衍等《红缨枪》编委沉默了一个时候后,突然抛出一批大字报,对革命群众运动评头品足,大泼冷水,激起了广大同学的义愤。

陶增衍们借同“孙悟空”讨论我校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为名,打着“重在表现”的幌子,攻击外文系革命同学的革命大字报是什么“列表式”啦,“唯成分论”啦,“把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啦,罪名多得很多。

陶增衍们比瞎子还要瞎!

“孙悟空”是哲学系学生胡守钧(后为“东方红公社”负责人)等组成的一个大名鼎鼎的造反派战斗小组。他们贴出《我校文化大革命处在十字路口》的大字报,指出某些校领导批周

予同、批陈传纲（前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而不联系本校实际，是“错误的方向”，这是一个“大阴谋”。继而，“孙悟空”小组又贴出“复旦党委及王零同志在运动中犯了严重右倾错误”的大字报，认为复旦党委是文化革命运动的阻力，心须坚决搬掉这块绊脚石。

党委为了自保，处心积虑抛出已经调离复旦的前校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陈传纲，想把他作为走资派的代表人物，试将烈火引烧到他的身上。在党内，才华横溢的陈传纲是个受排挤的领导干部。我们在刚入校时听过他的报告，很是生动，吸引人。此时他已调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长。复旦方面设计骗他回校来看大字报，下车伊始，就被团团围攻。陈传纲回去后陷于绝望，服药自杀了。

不管党委如何转移目标，机关算尽，造反派就是抓住徐震这个突破口不放。徐震眼看保不住了。王零在党委扩大会议上放马后炮，宣布“徐震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并声明党委对徐震问题“早有觉察”，“只是决心下得晚了”。徐震原来担任总支书记的中文系党总支，组织百余人贴出《彻底打倒徐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阴谋》的综合材料。徐震成了又一个丢车保帅的牺牲品。

8月8日晚上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党中央刚刚通过的《十六条》，赞扬“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复旦造反派一片欢欣鼓舞，精神大振。

8月11日 星期四

谭启泰、欧阳靖两同学的万言大字报：《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一早贴了出来，全校轰动。一部分同学要求广播，另一部分同学反对。有同学向党委请示，党委同志答应商量一下，在八点钟以前答复。八点钟过后，党委未答复，外文系广播台要广播，一部分同学反对。最后，郑子文同志（校党委副书记）答应在大礼堂广播谭、欧的大字报。

广播以后，坚决反对罢党委的官的大字报纷纷贴了出来。

新闻系的谭启泰和国际政治系的欧阳靖，是王零精心培养的尖子学生。这两个《红缨枪》“十三太保”中的成员，现在反戈一击，自然石破天惊，震动校园。这张大字报把许多内部材料抖了出来，揭露复旦党委“用‘斗牛鬼蛇神’的借口来压制群众揭露未揭露的牛鬼蛇神”，刮起一股“有统一组织，有统一领导”的“斗鬼风”。

接着，造反派声援与保守派反对的大字报都纷纷贴了出来，又是一场新的大辩论。依然出现工人的表态：“我们工人坚决反对罢复旦党委的官！”显然，这些旧招术已经不灵了。8月底，传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惊天动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风雨飘摇。造反派的大字报直逼“罪魁祸首”杨西光。当炮轰的烈火烧到上海市委身上时，老谋深算的杨西光终于被抛了出来。杨西光一倒，复旦党委以及保党委的“红卫兵大队部”也就通通垮下来了。

正如吴中杰先生意味深长在《复旦往事》一书中所说：

复旦党委在这种大背景下，无论怎样防卫、怎样挣扎，还是非被罢官不可的，这叫做“无可奈何花落去”。但是，当形势发生逆转，在另一种政治背景下，则这些被罢官者，自然又会复职，那就应了这句诗的下半联：“似曾相识燕归来！”

~~~~~

## 【人物追踪】

九十岁的聂元梓在想些什么

• 韩三洲 •

一、

2009年12月26日，周六，寒意料峭。中午，聂元梓老人打来电话，说今天是毛泽东的116岁冥诞，有人约她下午到“乌有之乡网站”去听讲座，问我能不能和她一起去？

我问她，知道“乌有之乡”是个什么性质的网站吗？那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左派网站，也就是毛派的网站，这个网站还在呼吁要把毛泽东的诞辰日作为中国的“圣诞节”呢。

她说不知道，眼下闭目塞听，也不会上网，更不懂现在的左右之分，只是想去看看听听，到那里不说话就是了。

我说，不管你说不说话，只要人去了，就等于表明了你的立场，会被人家当作招牌利用的。

但老人还是执意想去听听，还要我陪她一起去。推辞不过，就顶着寒风连同一个广播学院的退休干部一起打车来到位于海淀苏州街的附近的“乌有之乡”，等搀扶老人上楼后才发现，“乌有之乡”的讲堂里早已经挤满了人，而且是年轻人居多。主持人在前排给聂元梓找了座位坐下后，等拿出相机，刚给老太太拍一张照片留作纪念，就被人禁止了，说是这地方不能拍照。

下午两点，讲座开始，由前北大副校长梁柱主讲《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来回答“右派丑类们对伟大领袖的攻击与污蔑，因为他们对毛泽东得诋毁已经超出了当年的蒋介石！”在几个近两个半小时的讲演中，主讲人慷慨激昂，抑扬顿挫；满屋子听众激情洋溢，掌声不断。本来担心年近九旬的聂元梓会支撑不住，没想到她居然稳稳地坐着听讲，一直到了终场，真是令人称奇。

讲座结束后，还是有人认出了这个步履蹒跚、老态龙钟的老太太，居然是赫赫有名的聂元梓。有人争着与她合影，也有人询问她的近况。所以，连“乌有之乡”书店陈列的那么多图书都没来得及看，就匆匆走到楼下。此时，天已昏黑，寒风瑟瑟。在等出租车的空间，一个中年男子走过去冲着我们大声说：“聂元梓同志，你们当年搞得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太不成功了，不然的话，就不会出现今天的资本主义复辟局面了！”

面对这样的敏感话题，聂元梓喃喃地自言自语：“我们当时不都是听毛泽东的话，才干革命嘛，咋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啊？”

二、

2009年一年，对出狱已25年的聂元梓来说，心境复杂，有高兴事也有烦心事。

高兴的事是社会媒体又开始注意她了。南方一个颇有些名气的写过《袁庚传》的传记文学女作家，采访了她几次，说要为她出一本传记。这年暑天的时候，有关单位找到了她，说要录制影像资料，为历史留下注脚，影像留存，文字版权归个人。每天上午车来接送，到录影棚自我讲述，整整录制了38天。而聂元梓自己对五年前在香港所出版的那本40多万字的《聂元

梓回忆录》则很不满意，“那时候刚出狱不久写的，手边没有资料，全凭个人记忆，加上错字很多，图文不符，不好！”尽管如此，坊间还是出现过多种盗版书。“有三种盗版，一本比一本盗得好，证明这书还是有市场有影响啊！”老太太不无得意地说。近几年，她把这本回忆录改了又改，但也不知道哪家出版社能再重新出版。

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不但有很多对文革感兴趣的研究者拿着这本回忆录找到了她，还有许许多多早已相忘于江湖的旧友、甚至包括以前曾激烈反对过她的人，也都相继联系上了。新老朋友聚在一起，述往忆旧，过去的疮疤被一层层揭开，历史的真相逐渐浮现。于是，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也越来越清晰了。

烦心的事，就是在国内颇有影响的《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上，刊载了署名牛辉林的一篇文章《夜半抄家记》，作者讲述了文革中作为与聂元梓一起呼风唤雨的“红卫兵战将”，是如何聂元梓的指使，去查抄她丈夫吴淦之家的陈年往事。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不少媒体便加以转载，也成为不少人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作为妻子，居然抄了丈夫的家。这篇文章对聂元梓的刺激很大，一年来像噩梦一样缠绕着她。

“简直是胡说八道，造谣污蔑，无耻诽谤！”老太太一直在重复着这句话，“他（牛辉林）不也是造反派嘛，一个混世魔王，哪有资格撇清自己、往别人身上泼屎，搞人身攻击！”老太太按捺不住，写下了9条批驳意见，5月份就给了《炎黄春秋》杂志社，内中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附信，大意是“媒体应该公平公正，你们能登牛辉林的文章，也应该刊登我辩诬的文章，我将保留对对贵刊诉诸法律的权利”云云。其间，她甚至准备联系张思之大律师，想请他为自己代理这一诉讼。

半年多过去了，《炎黄春秋》未见刊载，聂元梓也曾多次询问过。一次，电话打到了责任编辑杨继绳的那里，聂元梓陈述了个人意见，责问对方为什么偏听偏信，不能秉公处置？结果杨继绳也发火了，回敬了一句：“你这还是文革那一套遗风啊！”接着把电话挂了。事后，聂元梓来电话告知此事，说：“杨继绳的脾气可真大啊！”她也许不知道，杨继绳如果没有那么大的脾气的話，也不会有他自己那么厚重的《墓碑》一书问世了。

不过，事隔一年之后，到了2010年，第1期的《炎黄春秋》到底还是刊载了聂元梓的《我对〈夜半抄家记〉的意见》一文，9条意见，尽在其中。老太太说，憋了一年的气，这才顺了点。她说，这封信最重要的是第9条，是一条对历史的辩诬，证明“全国第一张大字报与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并无关联。没有曹轶欧或者没有我聂元梓，那六位同志同样会写这样的大字报的，也同样会被毛主席批示广播的。因为这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思想目的而决定的。”

虎年春节到了，聂元梓说她给《炎黄春秋》编辑部寄去了一封信，对能予以她这个特殊的政治人物网开一面，让她说话，表示感谢。这也是40多年来，聂元梓第一次以个人的名字在国内媒体上刊登文章。

### 三、

其实，多少年来，聂元梓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对牛辉林一文刚刚作出回应，又出现了一个叫张朴的，在特区的一家刊物上刊出《聂元梓印象》，把她描绘出一个谄过与人、死不认错的政治动物与众叛亲离、与世隔绝的孤家寡人。文章最后不无讥讽地写道：望着聂元梓的垂垂老脸，我心绪如浪，这位当年号称“中国第一左派”的造反派领袖，如今住无定所，身无分文，差点靠乞讨度日。她活这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她的晚年凄凉，又是怎样造成的？如

果再给她一次机会，聂元梓还会为权力而疯狂吗？

这篇文章于去年年底在国内同样被四下转载、广为流播，让聂元梓的声誉再一次为往事蒙羞。文章附有作者与聂元梓的合影照片，可她看来去，怎么也回忆不起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作者了，“看来，以后要接受教训，不能随便见生人，省得不安好心的人又在那里信口雌黄！”老太太操着浓浓的河南口音，生气但又无奈地说。

不过，张朴文中的所谓“住无定所，身无分文”之说，根本就是主观猜测，随意编造的，也与聂元梓的现状大不相同。当年的“五大领袖”，除去谭厚兰1982年早逝外，其余的三人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各有自己的事业。经过多方申诉，聂元梓本人的生活起居，早几年已经归北京市民政局负责管理，并在蓟门桥一带暂借其两间住房；每月的生活费，已经由前几年的600多元涨到了今天的2600元了；看病就医按照离休人员待遇，全额报销。对此，聂元梓说：“别看蒯大富比我小25岁，他的身体还不如我呢，听说都中风好几次了，自理都难咧。”

尽管享受着如此“特例”，聂元梓经济上还是感到十分拮据。在高消费的北京，这点待遇远远不够，不过就是雇用一个保姆的工资钱，所以日子紧巴巴地不好过。“北京市有明文规定，像我这样提前假释、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应该由原单位接受。但我多年来屡屡给北大、国家教委甚至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求按照国家政策，还由北大来接受安置我，可迄今仍无下文。中间一度想为此事状告北大校长，可惜已是精力不逮了，算了吧。你可知道像我这样当年十二级的干部，现在人人都拿到一万多的月薪了。”

聂元梓说，她最大愿望就是想回北大，已经拟好了给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一封信，申诉自己的现状与委屈。她与这位高层领导的母亲是延安时代的同学，看看能否起点作用。“我没有别的奢望，就是想依照政策重回北大，让人生有个归宿。尽管文革中我有罪错，可我还是1937年便参加抗战的老革命，也是一个北大人，总不能老是依靠民政局的救济金来过日子吧。另外，这也不是关系到我一个人的问题，是文革遗留的一大批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 四、

在一个耄耋老人的眼里，往事还真的并不如烟。几年了，每次见面，有事没事，话题就会聊到文革上面。她回忆，文革初起，各个院校都有造反派组织，可毛泽东为什么偏偏选定了北大作为他的“文革策源地”，这才让事态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轰轰烈烈地发展到全国。毛泽东与北大有宿怨，早年他在北大图书馆登录室勤工俭学时，曾受到代理馆长张申府的冷遇，有一次，因为毛的字体潦草，张要他重新再填写一本图书卡片，看到了毛的脸上有犹豫之色。延安时期，凡是有北平到延安的，毛都要询问张申府的情况，解放之后，他几次提到“张申府、张老板面色很难看啊”。所以，张申府于建国前因为第三条道路被开除民盟成为人民公敌，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都与此有关联。

到了1957年反右，北大更成为重灾区，教职工打成右派的90人，学生右派421人，共计511人。但毛泽东不高兴了，嫌北大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就把铁道部的陆平派来担任校党委书记。到了这年10月以及来年春季，不少的单位就已开始对右派进行甄别了，也就是给明显搞错的、不是右派的人摘帽，可北大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又搞了一场三个月的“右派补课”，补划右派173人，总数达到了699人（一说是716人），其中教职工110人，学生589人，占到了总人数的百分之七。

聂元梓说到，文革初起，有人在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流布很广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被监督北大文革的李讷汇报给毛泽东听，毛泽东说了：“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

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并且让女儿李讷向聂元梓传达了这句原话。一个“深”字不要紧，运动又火上浇油似地升级了。尽管如此，毛还是感到不满意，到了1968年7月28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四大领袖”，直接对聂元梓说，“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北大才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吧。”到了这年年底的12月18日夜，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夫妻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也是熬不过去的结果。

直到今天，聂元梓还坚持认为自己是纯属政治判决。她说，拿这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来说，该由谁来承担历史的罪错？是被人称为“五个指头”，大拇指即发动者毛泽东的罪错，还是林彪、四人帮的罪错？或是我们这些被判刑囚禁了十多年的“五大学生领袖”的罪错？谁又能知道文革的真实内情？像我这样一个当年被全国上下视为大红大紫的“造反第一人”，还不到两年时间，就在十万人大会上被江青说成是“聂元梓太骄傲，谁的话都不听了，叫她反右她反左，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自此就把我给逐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了。也许当年聂元梓的名字还有被利用的必要，对我的拘留审查对外没有宣布，九大时，我是在学习班里批斗中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九届二中全会，我是从居留地江西被三个人押解进京参加会议的，会后又押解回去。连自己什么时候被选为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8341部队的杨德中），都不知道，还是后来从我的判决书上看到的。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可以说，人们并不了解我在文革中的实际情况。

在她有期徒刑十七年的判决书上，清清楚楚地写道：“本庭确认，被告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对此，聂元梓愤愤不平：十年文革，政治风云瞬息万变，人事沧桑白云苍狗，其后的8年，我都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监禁中渡过的，如果有正常历史思维的话，请问：文革初期，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形成了吗？如果没有形成，当初我所追随的，又是什么“集团”？判决书上为什么非要把我与这后来才有的两个集团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 五、

“都是墙倒众人推，毫无是非公道！”这是聂元梓对当下“文革学”的一种评介。作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当事人，任意被人妖魔化，有人说她是“乱世狂女”，有人说她“政治野心家”，是文革的“始作俑者”。沪上的一个颇为影响的传记家，在文章中还言之凿凿地说她早已经死了。对此，她感到委屈，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政治玩偶，让人高高抛起，又重重摔下，再由人恣意糟改践踏。激愤之状，溢于言表：“人一倒霉，啥坏事都往你头上推！我是谁呀，一张大字报就在全中国掀起那么大的浪，能让天下大乱了？”

聂元梓不明白，民间为什么会流传邓小平的一句话，一看到聂元梓，就想到了我那跳楼的大儿子。甚至还有传言是她叫人把邓朴方从楼上推下去的。这些传闻，恐都不是空穴来风。所以，文革结束后，新校长周林一进校，就宣布“四人帮”对聂元梓的隔离审查、批斗劳改的一切规定继续有效。而聂元梓本人从内部发行的《北京大学纪事》上，还找到了这样一段史料，1978年3月22日，邓小平约见包括北大校长周林在内的教育界人士，特意问到聂元梓怎么样？当听到有人说她要翻案时，邓说：“她有什么案可翻？聂元梓你们为什么不批？这个人至少应该开除党籍，调到别处去劳动，她有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动作用，康生说王八蛋也要支持嘛！”

所以他认为，这也决定了自己被判处十七年的案子，出现不允许上诉、也不让证人出庭这些违背法律程序的现象，直到今天，控检方连当年的一张终审判决书都没给我。聂元梓辩解说，邓朴方的跳楼致残，与我并无关联，我能不翻案吗？且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的讲述：“八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邓楠回来告诉我们，

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注意，时间是八月末，也就是工宣队进校十天以后的事情，而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军宣队进入北大后，从此北大的一切权力，特别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统统归宣传队行使。”此时的我，也已经失去自由被隔离审查批斗了，与邓朴方的跳楼有什么直接关系？更可笑的是，对我的判决书认定：“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在被告人聂元梓指使下，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致使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瘫痪、终身残废。”这里，硬把邓朴方跳楼一案的发生时间，几近提前了五个月，这真是罔顾事实的违心之论啊。

判决书上，还有一个有待澄清的历史公案，上面写道：“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江青派人把被告聂元梓秘密接到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密谋，派聂元梓去上海‘造反’。”聂回忆，审讯我时，我请法庭出示与江青勾结的证据，可他们既无旁证、又无佐证，可以说没有一份能证明是江青指使我到上海造反的相关材料。现在，我自己从香港出版的《王力反思录》上，找到了一条最有力度的证据，证明派我去上海的根本不是江青授意的，而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当时作为中央文革办公室主任的王力在回忆中详述了这一事件：“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想法，是想把北京的群众组织、学生、工人、机关干部、造反派连在一起，通过聂元梓等人到上海串联，把北京和上海连成一片。江青找我，主席的设想，组织个班子去上海，最早她想李讷（肖力）要去，聂元梓去，阮铭也要去，搞个比较大的班子。聂元梓住在中央文革，叫她负责筹备这个班子。李讷找过我，我介绍她见过聂元梓。江青说李讷去不去，毛主席正在考虑，因为她正在搞农村文革的指示。后来江青又传达毛主席指示，李讷不去，阮铭也不去，班子不要那么大，聂元梓也不要代表北京市的红卫兵组织，只代表她自己 and 北大的群众组织，用北大群众组织的名义去上海……我跟聂元梓说时再三叮嘱这几条，说是毛主席、中央文革的决定。”

## 六、

2010年春节一过，转眼就到春暖花开的四月天了，聂元梓89岁的生日就在这时候。按照中国人“过九不过十”的传统，也就要迈入她“九十初度”的岁月了。对一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曾经大红大紫、但又大起大落的人物来说，好像早已经盖棺论定了。但在民间，她并没有被历史尘封，依然是一个被屡屡提起的话题。对自己的政治生涯，聂元梓说，她自己经常会扪心自问，我怎么会成为反革命呢？我16岁就参加革命了，可以说是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我父母兄妹全家十一人都在为党工作，两个人壮烈牺牲，6个人坐过敌人的监牢。父母将全部家产都捐献给国家，至今我们家的房子还办着学校，中共河南滑县县委就是在我家成立的，历届县委书记包括赵紫阳同志都是在我家里办公。参加革命后，我就抱定了为党牺牲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怎么会产生反党思想和参与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

聂元梓认为，不是要提倡反思吗？但全民族都要反思，要双向反思，对的不可能全对，错的也有其历史原因。她说自己90岁了，前45年只知道跟党走，路走对了；后45年也是自觉跟党走的，没想到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看看今天的社会现实吧，经济是发展了，日子是好过了，但官场贪腐、贫富悬殊、触目惊心，以党心、民心来看，难道说能比40多年前的社会状况更好更公平吗？过去提“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打倒”和“砸烂”一切固然不对，可对革命的原动力来说，包括文革，不也是因为官僚主义的存在和社会不公的因素而引发的吗？

近距离观察，虽说是年届九旬的老人了，但聂元梓的思维还很清晰，她说，直到今天，自己才深刻地悟出一句名言的真谛：历史永远是胜利者和权力者写就的。她解释参与文革的动机，“我当年来北大，是大哥聂真与陆平联系的，我与陆平本人并没有个人恩怨。”所以，对“何其好也”的那张大字报来说，它的恰逢其时的出笼以及所产生的病魔般的效应，绝非今天一再重

复地“造反”二字所能涵盖的，这里面既有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中央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和“防修、反修”伟大号召的正常反应，也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在北大历次运动中所造成的积怨爆发所致。这多种合力的结果，才有了“第一张大字报”的出世。

按照官方的说法，十年文革等同于十年浩劫、十年梦魇。可是发动者为什么还是万众景仰的“英明领袖”；党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举手赞同文革的有些领导人反倒成了受害者、甚至还要加害别人。一个国家与一个党的错误，能否就这样利用“政治替罪羊”审判方式，轻而易举地算在几个“造反派”身上。这样刻意营造的一种的历史记忆？距离客观公正又有多远？现在不是天天说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吗？尤其是亿万民众所亲历过的文革史，更不应该是任人随意来曲解的，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

一经回首往事，每每心有不甘。90初度的聂元梓又说了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只要我活着，就会继续申诉，不为别的，就是觉得自己这辈子太冤，90岁的人了，不知道还能有几天活头，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             |          |

---